



重推

羊皮筏上的成长记忆

□ 王光辉



漂流在黄河上的羊皮筏子 资料图

刘虎在他的《少年筏子客》里写道，黄河兰州段平日里看上去总像是一个悠闲的老者在云中漫步，淡定，慈祥，辽阔的胸襟似乎能承受世间的任何伤痛。黄河是母亲河，刘虎却给了它一个父亲的形象。这也没错，对于兰州这个城市而言，黄河如父母一样赋予它内在的骨血和灵魂，又给了它外在的灵性和灵气。因为黄河，这个城市有历史也有性格，而这正是《少年筏子客》想要讲述的故事。

看刘虎的《少年筏子客》，你会觉得他一定亲历了黄河数百里的漂流，才能把黄河从兰州经宁夏到包头的每个河滩每个河湾每个漩涡，还有筏子客与黄河水生死相搏的每个时刻都写得那么

惊心动魄，让人绷紧神经跟着他的文字去体会黄河的多重面孔。

看他写羊皮筏子进入大照壁那一段，“澎湃的河水在惊天动地的怒吼中张牙舞爪地扑向那堵在它前面的崖壁，撕扯，击打，撞击，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千层浪气势磅礴地涌向半空，反卷出层层叠叠的浪花。而悬崖面无表情，岿然不动地站立在原地”。在这样的惊天骇浪中，作者描写了一个十四岁的兰州少年在羊皮筏子上的成长。

黄河的形态无疑是变化多端的，在作者的笔下也是姿态万千的，一会儿它是“脾气暴躁，精力过剩、充满野性、喜欢狂想的青年，一丝一毫的情绪波动，都恨不能掀起惊天狂澜”；一会儿又是“志得意满、宁静淡泊的中年书生，哪怕是生死攸关的时刻，也难以夺去他的沉

稳”。对于水流的描写也丰富多彩，在黑山峡那一段，“河面上翻腾着密集的浪花，让人怀疑有人在河底架了把火，把河水烧得沸腾了”。在河面上随波逐流的羊皮筏子，“不是进入了谷口，而是被一条巨大的舌头猛然一卷，咽到了肚子里”。这样生动的描绘，让人觉得作者就是一个在黄河里翻滚过的筏子客，他肯定水性极好。

基于文字所呈现的文学性，《少年筏子客》的故事十分吸引人。故事发生在抗战时期，处于大后方的兰州受到日本飞机轰炸，十四岁的主人公生子因此而成为众多失去父母和家园的孤儿之一。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加入以“石墩”为首的流浪孤儿群体，和他们一起讨饭；一是靠自己的毅力去谋生，在艰难困苦中磨砺并成长。生子选择了后者，也选择了属于自己的成长道路。

在历史上，羊皮筏子曾是黄河中上游这一特定区域才有的运输工具。在交通尚不发达的时期，它很长一段时间在甘宁青的黄河上充当着载人运货的角色。尤其是在昔日的兰州，羊皮筏子是沟通黄河两岸最便捷、最常见的交通工具。时过境迁，如今羊皮筏子成为需要保护性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在旅游景点上，它仍然是让游客倍感新奇的旅游体验项目。

抗战这一时代背景，使得本书具有了鲜明的时代性特征。抗战时期的时代主题是激昂的爱国主义，《少年筏子客》对这一主题的提炼，使得羊皮筏子走向了为抗战开辟新的交通路线的历史大舞台。一群筏子客从黄河转战嘉陵江，要把产自甘肃玉门的石油，通过羊皮筏子运送到重庆。石油是前线急需的战略物资，而敌机对交通路线的轰炸，使得沿嘉陵江顺流而下成为最安全快捷的通道。熟悉黄河水性的筏子客，在嘉陵江这一陌生水域里实现了精神境界的升华，他们不再是一群驾驭羊皮筏子谋生糊口的筏子客，而成为一群为抗日救亡而敢于牺牲的民族英雄。一样的激流险滩，一样的生死一线，而筏子客的职业意义此时由“家”而“国”，他们的形象顿时伟岸起来。通过一趟趟与嘉陵江搏斗的历程，主人公生子也完成了人生意义的追寻，踏上了抗日救亡的新征程。

《少年筏子客》的故事是有历史原型的。据史载，1941年，兰州的筏子客王信臣用2000个羊皮囊，制作了5个

大型羊皮筏子，用了两周时间，将数吨石油从广元沿嘉陵江运送到重庆，为抗日前线送去急需的战略物资。关于兰州羊皮筏子在抗战时期参与战略物资运输的历史，作者在书中写道：“1942年到1943年，这帮来自黄河的汉子，每年至少在嘉陵江上航行八次。玉门平均每年所产石油约有七分之一都是由羊皮筏子运到重庆的。”

除此之外，《少年筏子客》所写的抗战时期日本飞机对兰州的轰炸，也是源自真实的历史事件。1939年，日本飞机对兰州进行了多次轰炸，因为中国空军的奋勇抵抗，“兰州空战”的胜利成为鼓舞中国人民抗战斗志的大事件被载入史册。但轰炸给兰州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和损失。作者在书中这样写这段历史：“那两年，兰园、五泉山的普照寺、中山市场（当时兰州最大的综合市场）、兰州师范学校、绸铺街、西关什字等人口密集地区，大都遭到了日本人的野蛮轰炸，市政机关和工厂也是轰炸重点。侵略者轰炸时除了投放炸弹，还会投放大量的燃烧弹。每次轰炸，市区都会出现一片又一片的火海，火海之后，是一片焦枯的废墟。”

《少年筏子客》用文学的方式，复活了一段抗战时期的兰州历史。黄河在这个城市里平缓奔流，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像河水一样含蓄内敛。河面下有我们看不见的暗流涌动，兰州的历史也有我们不曾忘却的慷慨悲壮。《少年筏子客》写的是一个兰州少年的成长故事，反映的是兰州人沉淀在基因里的敢于搏击、积极上进的地域精神，还有如黄河水一样源远流长的家国情怀。

《少年筏子客》，刘虎著，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书评

探索新词语的更多可能性

□ 沈国威

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向东的新著《新名词、外来语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研究成果，它试图从新词语和新文学的关系这一角度审视现代中国文学成立的过程。拜读之后，我不揣冒昧地写一些心得。

胡适1916年底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主张。最初，除了“不用典”以外，胡适并没有具体地谈到词汇问题，直到一年后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才提出：为了实现国语的文学（即白话文的文学），不妨随时随地“采用文言里两音以上的字”。傅斯年、周作人等也都提出了在词汇上需要撮古补今的建议。胡适以后，言文一致成了新文学标榜的语言形式，而词汇与文学一致，乃至文学的国语关系究竟如何？

《新名词、外来语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第一章“清末民初新名词的流行与争议”，仔细梳理了社会上对新名词的否定性反应。作者把搜寻的对象扩展到文学性的刊物，时间也延长至现代汉语初具规模的20世纪30年代，提供了更多的例证，尤其是对新名词入诗多有论述，展示了新名词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在接下来的章节里，他主要讨论了新名词、外来词引发的文学本身的变化；“五四作家”所受到的新名词等的影响；革命词语和感觉词语在展示都市现代性上的作用。第六章则聚焦农村题材的小说，从词语特征上进行了分析。由政论到小说再到诗歌，由城市到农村，这些都表明新词语已经渗透到语言社会的方方面面。孔子说“辞达而已”，意思是只要能想把说的表达出来就好，但又说，“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前者是最低的要求，后者是为之努力的目标。文采决定了传播的广度，胡适文学的语言看重的也是这一点。陈独秀说过白话文的普及要有文学家们的支持；普通话定义中的“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等都说明对于文学作品中新的语言形式极为重要，这也是作者这本新著的亮点。

通过该书，我们可以对一些作家或文学作品在新名词使用上的特点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英华大辞典》（1908年）对“文学”的定义是：“从某种特殊意义上说，纯粹的哲学和科技性的文章不是文学，无论是纪实还是虚构，以精神为素材，以想象力为形式的文章，才是文学作品的主体。”以精神为素材，以想象力为形式是文学的两大本质，其实现与词语的使用是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知道了某些作家新名词的使用情况，这与他们文学语言的特点有什么关系？也就是，矛盾之为矛盾，郁达夫之为

郁达夫，在新名词上是否有因人而异的个性？再比如，中日近代文学史上都有“新感觉派”，这一派作家在形容词使用上的共性和个性都是饶有兴味的问题。总之，事关文学的语言是什么这一大命题。

作者在书中多次强调新名词造成了一种新的节奏。复音词的另一个作用是精密描写，应对日益复杂的概念更新。但是，大量的新名词的涌现会不会成为当时读者的阅读障碍，有没有误解？《辞源》（1915年）编纂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成为古今之津梁，解决新学和旧学的隔绝状态。柴萼在他的《新名词》（1926年）里说樊增祥把“过渡时代”解释为“由此岸达彼岸方及中流之时也”。全国之人方半济于风涛之中，半立于崩沙之上，而欲学彼岸之人之坦行捷步”，这种调侃一方面“亦足解颐”，另一方面也说明新词的普及还在“过渡”中。张向东教授的新著读后使人掩卷深思。该书中蕴含着继续深入探索的无限可能性，不论是语言研究者，还是文学研究者，都能从中发现自己的新问题。

《《新名词、外来语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张向东著，商务印书馆出版。本文系该书序言，有删节》

纸上书店

《铁的红军是怎样炼成的》

王新生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该书以大量珍贵史料为基础，生动展现了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工农红军逐步壮大的光辉历程。全书由“无枪杆子之痛”“走上创建人民军队之路”“罗霄

山脉飘红旗”“驰骋赣南与闽西”“在反‘围剿’战争中越战越强”五章组成，记述了工农红军创建并在一次次战斗中逐步锤炼成一支铁军的历程。

《文明的积淀：中国古代科技》

孙小淳 著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这是一部对中国古代科技精神深入探索的普及读本，揭示了中国科技发展的独特路径和丰富内涵。本书不仅展示了中华文明在科学技术上的伟大成就，也让我们看到了科学与文化如何在中

国的历史长河中交融并推动着社会发展进步。它既是一部科学史著，也是一部文化启示录，揭示了科学和文化如何共同塑造了我们的过去，并为我们的未来提供宝贵的启示。

《考古四记：田野中的历史人生》

郑嘉励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以田野考古调查笔记的笔调，清晰地呈现了作者的20多年求索之旅，努力在考古工作者与公众之间建立起知识、情感和思想的联结。全书分为四个篇章：考古记，重返考古发掘现场，

还原第一线的遗址和墓葬发掘场景；田野记，讲述田野考察中的见闻与思考，传递考古工作的趣味；历史记，探析古迹与器物之奥秘，呈现一幅幅完整的历史图景；人生记，追忆无法忘怀的人与事。

动态

《武威耆旧传注译》出版

近日，《武威耆旧传注译》一书由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由武威市凉州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赵大泰、助理研究员王丽霞校注、翻译和研究。

武威，古称凉州、姑臧，地处丝绸之路咽喉要地，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境内存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迹。清代武威文风鼎盛，人才辈出，考中进士者就有41人。在武威众多的进士及其著作中，潘抱奎及其《武威耆旧传》堪称“奇人奇书”。

潘抱奎（公元1784年—1829年），字太冲，号石生，一号兔波。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得中进士，曾任吏部考功司主事，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病逝于北京。潘抱奎才华横溢，交游广泛，为人豪爽，扶危济困，在河西、陇东声名远扬。在京为官期间，对赴京的河西学子接待用心、照拂有加。其著作有《通鉴论》《燕京杂咏》《武威耆旧传》等。

《武威耆旧传》成书于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共分四卷，38篇文章，从《李少保传》到《家四学博传》，是清朝时武威38位杰出人物的传记。这些人物学业优异，金榜题名后，或外出为官造福百姓，或主讲书院培育人才，或研究学术著书立说。

《武威耆旧传》中的文章兼顺传记与地方风物地理的描述。作

者潘抱奎多年在京为官，交友广泛。这本书对研究清代武威历史、社会、科举教育、自然地理和清代的乡党关系等都具有极高的价值。

潘抱奎去世后，其同乡进士、学术大家张澍将该书刊印传世，并撰写了序言。其同乡进士李于潜《潘抱奎传》中认为，武威人才济济，但事迹往往不为人所知，《武威耆旧传》为耆旧儒士立传，是一件幸事。《甘肃人物志》中写道：“抱奎以武威志久失修，恐文献无征，著《武威耆旧传》，质茂淳雅，有古作者之风。”另外，正如《武威耆旧传注译》作者赵大泰所述，潘抱奎开创了清代武威文人作传的风气与传统，使得当地的文化传统得以传承。

在《武威耆旧传注译》一书中，赵大泰、王丽霞不仅对《武威耆旧传》进行了详细的注译，而且搜集了其他有助于了解潘抱奎的相关文献，为我们提供了非常翔实的研究武威和凉州文化的珍贵史料。凉州文化，正是在前辈大师和后世学者的薪火相传中愈加璀璨夺目。（王郢）

启事：凡因条件所限，未能及时取得联系的作者，敬请与本版责任编辑尽快电话联系，以便我们为您付酬。

导读

晒书也是晒学问

□ 陈泽来

七夕是我国岁时习俗中的一个重要节日，晒书则是节日活动中一项重要内容。入伏后天干物燥，古人觉得七夕这天天门洞开，能把书籍和衣物晒透，文人学子们便纷纷将藏书搬出来，摊在阳光下暴晒，以达到驱虫目的。西周时期的历史典籍《穆天子传》中有“天子东游，次于崔梁，曝蠹书于羽陵”的记载。东汉崔寔在其所著《四民月令》中云：“七月七日，曝经书及衣裳，不蠹。”这说明我国从汉代起，就有了七夕晒书的习俗，魏晋时期，七夕晒书已相沿成风。

毫无疑问，晒书本身是极其有效的护书方式，尤其是在南方地区，长达数月的梅雨季节里，高温高湿对书籍或多或少有一些破坏。晾晒书籍，可以祛除潮气、防霉防虫，从而有效地保护藏书。

宋代的官办晒书会，几乎云集了当时文化行业的顶级精英。有关晒书会的盛况，宋人笔记中多有记载，据南宋洪迈《容斋四笔》、南宋陈骙《南宋馆阁录》等书记载，宋高宗绍兴、宋孝宗淳熙以及宋宁宗庆元年间，都组织有“晒书会”这样的文化活动。宋代晒书会一般由掌管图书的秘书省主持，临安府具体承办，多在农历七月的五、六、七日举行。由于南宋都城杭州地处东南，气候潮湿，因此南宋比北宋更重视晒书。“馆阁晒书会”的层次比较高，展品不乏稀世珍品，能参会的大多是大臣名流，而当时的书法和绘画名家，基本上都在朝中担任

各类职务。一年一度的晒书会，无疑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盛宴。在官方的推波助澜之下，这一习俗在民间更加流行，很多读书人甚至借七夕晒书来展示自己的学问。

晒书倘若抽除了俗世的浊气，仅止于晒学问，倒也无可厚非，晒学问可以看作某种意义上的学术交流。南朝刘义庆所著《世说新语》中记载了这样一则趣事：西晋时期，七月初七这天，当地乡绅纷纷晒书炫富，各种衣裳锦被琳琅满目置于阳光之下。唯有大司马桓温手下的参军郝隆，搬出竹榻放置庭中，在烈日当头的正午时分俯卧于榻上，解开上衣袒胸露腹，在烈日下暴晒。众人不解问他作何，郝隆大咧咧地说：“我在晒书！”原来，家境清贫的郝隆饱读诗书却无华衣可晒，自嘲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当别人晒晒衣物时，他却用“晒书”的独特方式，来夸耀自己腹中的才学——你们晒衣裳，那我就晒肚皮。“竹林七贤”之一的音乐家阮咸，不屑于有钱人家晾晒衣物借此攀比的低俗把戏，于是找来一根长长的竹竿，在自家庭院中漫不经心地挑起一块破布短裤，任短裤在风中猎猎招展。

在信息化时代，人们热衷在微信、抖音上晒美食晒旅行晒感情，比起那些晒名车晒豪宅的行为，七夕晒书的习俗至少说明，我们内心仍保留着对书本的渴慕和尊重。